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史 1929~1990

.....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UME II, 1929-1990

M.C.霍华德 Michael Charles Howard 著
J.E.金 John Edward King
总译校：顾海良 张 新

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史 1929~1990

—•••—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UME II, 1929-1990



[英] M.C.霍华德 Michael Charles Howard 著
J.E.金 John Edward King
总译校：顾海良 张 新
译者：郑吉伟 韩金华 吴雅杰
赵 准 严 冰 赵雅沁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京权)图字:01-1999-1463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ume II, 1929-1990

© M. C. Howard and J. E. King 199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 / (英) 霍华德等著;顾海良、张新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2

ISBN 7-80109-632-0

I. 马…

II. ①霍…②顾…③张…

III.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1929~1990

IV. F0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7578号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麦克米兰公司授予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66521270 66521152 (编辑部) 66171396 (发行部)

E m a i l: edit@cctpbook.com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字 数: 494千字

印 张: 26.75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80元

译者前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年)》是 M. C. 霍华德和 J. E. 金合著的两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的第二卷。两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是 20 世纪末西方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历史发展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两卷本的第一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年)》出版于 1989 年。该卷对 1883 年马克思去世后直到 1929 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作了阐述。该卷从恩格斯和马克思经济学遗产关系的分析入手,集中评价了恩格斯晚年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意义,以及恩格斯与各种流派的经济学家围绕价值问题展开理论争论的过程及其得失。接着,对 1895 年到 1914 年间西方学者(主要是德国学者)关于价值理论的进一步争论,伯恩斯坦、卢森堡和考茨基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以及考茨基、希法亭、卢森堡和奥托·鲍威尔等人关于帝国主义与战争、金融资本、资本积累问题的讨论等等作了展开论述。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到 1917 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俄国的发展是该卷的重要论题,作者分 19 世纪 90 年代、1905—1914 年和 1914—1917 年三个时期展开论述。该卷的最后部分,集中于 1917 年到 1929 年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同样主要是在德国)的新的趋向,其中如弗里茨·斯滕伯格的新的帝国主义理论、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学理论以及亨里克·格罗斯曼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等等。

两卷本的第二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年)》出版于 1992 年,主要是对 1929 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直到 20 世纪初苏联东欧剧变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的阐述。第二卷的内容是第一卷内容的继续。因此,在本卷的“导言”中,作者就提出:“在第一卷中,德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占统治地位,因为 1929 年以前,这两个国家实际上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讨论。但是,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理论分析的重心开始转向西方,以至于西欧和北美在战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新的难题也在这一时期出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早先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些东西被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在本卷的一些章节中,我们也对本卷主要涉及的年代之前的文献进行了考察。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变得越来越难以

界定,因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用来克服马克思主义分析上的缺陷或被用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些,可以看作是对本卷内容及其特点的最为概要也是最为精要的说明。至于第二卷的主要内容及其基本观点,作者在“导言”中作了阐述。

当代西方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多是以“学术的”、“考据的”视角对待马克思主义历史和理论为特点的,一般被列作西方“马克思学”范围之内。M. C. 霍华德和 J. E. 金的两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总体上也持这种理论倾向。因此,两位作者的许多观点,我们都是不赞成的。但同时,对这种“学术的”、“考据的”研究以及形成的理论观点,对我们的研究还是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益的。这就是我们组织翻译本书的初衷。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年)》是在我的主持下,主要由我指导的几位在读的或已取得学位的博士研究生合作完成的。各章初稿翻译分工如下:郑吉伟:导言、第1—4章、结束语;吴雅杰:第5—8章;赵准:第9章和第16章;严冰:第10章和第11章;韩金华:第12—15章;赵雅沁:第17章、第18章。张新协助我对初稿作了校译、修订,最后由我定稿。应该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尽了全力,但译校的讹误之处依然难免,敬请读者们指正。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一直得到李其庆同志的支持和鼓励,也得到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辑的大力支持,一并表示感谢。

顾海良

2002年6月10日

致 谢

我们非常感谢彼得·拜尔哈茨、肖恩·哈格里夫斯·希普、约翰·贾沃斯基、塔尼亚·科罗夫金、彼得·克里斯勒、拉梅什·库马尔、弗雷德·李、约翰·洛德韦克斯、布鲁斯·麦克法兰、法德勒·纳基卜、布赖恩·波利特、约翰·辛格尔顿、彼得·斯科特和诺埃尔·汤普森的有益的建议和批评。有些章节先前曾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第1章曾发表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16章曾发表在《政治经济学评论》上，第17章曾发表在《社会经济评论》上，第18章曾发表在《国际社会经济学杂志》上。还要感谢拉-特罗勃大学和沃特洛大学图书馆内部借阅部的工作人员，感谢基思·波维在编辑上付出的劳动，感谢科琳·奈特、卡伦·马塞尔曼和安·文特提供的卓有成效的辅助性劳动，以及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会在研究经费上给予的巨大支持。

M.C. 霍华德

J.E. 金

导 言

在1989年出版的第一卷中,我们考察了自1883年卡尔·马克思去世至1929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这次出版的第二卷阐述其后直至现在的历史。第二卷中事件从许多方面来说,都颇为不同。

在第一卷中,德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占统治地位,因为1929年以前,这两个国家实际上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讨论。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理论分析的重心开始转向西方,以至于西欧和北美在战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新的难题也在这一时期出现,马克思经济学中早先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些东西被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在本卷的一些章节中,我们也对本卷主要涉及的年代之前的文献进行了考察。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界定,因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用来克服马克思主义分析上的缺陷或被用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尽管如此,1929年以后最富有戏剧性的变化,也许就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同成功的革命实践相脱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早期布尔什维主义者是独特的,他们是那些以马克思的名义发动革命的、通常最为才能出众的理论家。像早期布尔什维主义者的这种结合,至今再没有发生过。

但是,在给马克思主义带来巨大希望的1929年,事情似乎并非如此。在东方,斯大林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攫取了1917年夺得的政权,创立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加速了经济的发展,并产生了一种新的正统观念。在西方,大萧条的爆发预示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和苏联孤立地位的结束。如果实践和经验是检验理论价值的标尺,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将会从这些事件中感到欢欣鼓舞,而自由主义者则害怕他们的社会和理论世界正在破碎。但是,这些现象已被证明是虚幻的。第2章阐述的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是脆弱的,根据第3章所考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批判者的观点,斯大林模式要么是经过打扮的新的剥削秩序,要么就是社会主义仅仅处在潜在形态并且早已显示出蜕化迹象的社会形式。战后的岁月证明,这些观点是完全正确的。20世纪30年代,已有明显的征兆表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病态的。然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首先分析证实了这一现象,可能是一种谬误;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的谴责比分析更

为有力。另一方面,第1章考察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大萧条的解释也是令人失望的;他们尽管偶尔也颇具洞察力,但是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经济学分析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危机理论方面比主流理论家们更具优势,但是最具盛名的理论创新却来自后者,即凯恩斯的《通论》。

斯大林主义的失败不应当引起很大的惊异。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从来就不是一种服务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本人对工业化引起的社会转型问题的论述,实际上排除了马克思主义既适应于该项任务同时又保持其完整的可能性。人们难以说清楚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大萧条的著述的缺陷,但这种缺陷部分地可能产生于对主观主义理论的敌视。当这种敌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合理地确立起来时,在对实现问题的分析上确实会产生很多困难,因为实现问题必然涉及需求不足,并由此反映消费决策。事实上,在1917年以后,不同的、有细微差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为关注的是“主观因素”,但在20世纪30年代,理论家们仅仅限于关注其在上层建筑和政治革命中的作用,没有对经济分析中客观主义作出限定。只是在战后的年代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才日益意识到以下问题的重要性:经济现象不完全被看作由结构因素决定的行为结果。只有到这时,他们才认识到,即使经济行为由结构性因素决定,对它发生的机制进行分解性叙述也仍然是重要的。

本卷第二篇对一个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问题,即凯恩斯主义理论融入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作了概述。第4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在战后已经发生变化的问题作了评论,第5章考察了凯恩斯与马克思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两章为人们理解有效需求原则如何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研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长期繁荣”提供了背景。三个基本问题中的两个——第6章对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概述和第8章对军事经济的分析——涉及的理论,显然包含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第三个基本问题以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的阐述为基础,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原教旨主义对任何形式的凯恩斯主义修正主义的回答;它坚持垄断资本和军事经济理论中的任何有效的东西,都可以根据剩余价值生产而不是剩余价值实现作出最好的解答,剩余价值的实现是使凯恩斯主义思想必然受到限制的派生的论题。这一观点中有一些真理的成分,但将其建立在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的分析上,则是一种严重的缺陷。19世纪90年代,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证明,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根本不是一个规律;最近60年这一观点被反复确认,如第7章所阐述的那样。不顾这种情况,一再坚持马克思所分析的利润率下降的贴切性,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声誉造成诸多不良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分析“长期繁荣”问题的同时,也试图阐明为什么资本主义的推动力没有伸展到第三世界的问题。第三篇的第9章和第10章阐述

了不发达理论,提出世界经济排除了边缘国家独立发展的根本性质(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所持的观点不同)。这一新观点的大多数论据,无疑来自于像俄国和中国等落后国家发生的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革命;不发达理论似乎可以对此作出解释,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则不能。实际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正是以此证明古典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但这是不正确的。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就认为社会主义与落后是不相容的,实践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另外,一般来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有可能成为一个新阶级社会的思想意识,但其理论结构却具有这种可能性,而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很快承认,这种情况在1917年后的苏俄实际上已经发生了。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与不发达理论相联系的类似的反应,对此我们将在第11章中讨论。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回归马克思”的思潮,但是,由此引起的对新马克思主义不发达理论的批评,却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些最优秀的著作,决不能将这些著作斥为蒙昧主义而不加理睬。

第9章、第10章和第11章的内容确实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成功的革命实践与其理论认识已经相互独立。莱斯泽克·科拉科夫斯基对毛泽东的描述,实际上是第三世界革命的一般性经济思想的真实写照;他们“极其原始和笨拙,有时甚至带有些孩子气;与此相对照,即使是斯大林也给人以大理论家的印象”。¹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赞同——但很少明确指出——并且事实上已经抛弃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观点²;即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解释这个世界,而不是改造这个世界。20世纪60年代,西欧和北美的大学迅速扩大,极大地推动了这种趋势,因为它允许在社会主义政党之外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构,并产生了实质上脱离政治运动的“左派学术团体”。不管马克思的实践理论的含义是什么,这样是有利于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声誉的,而不是使之完全屈从于荒谬的实践。

有时,结果是难以预先料想的。他们当然并不赞同那些极端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些反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是一小部分老学究组成的团体。他们的错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在本书第四篇论述)中暴露得最为明显;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主导了对刻板的经济理论所做的惟一最为重要的批判。但是,通过将这与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攻击结合起来,他们同样认为,只有按唯物主义重建政治经济学,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并使之与凯恩斯的理论相融合。主流的理论家被置于被动防守的位置,尽管他们在还击中取得一些成功,但新古典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被修改了。此外,这些争论也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理论之间可能出现一些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方法的严密性上说已经成熟,这使得人们对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和早期的新古典理论中什么是站不住脚的问题,形成广泛一致的看法,即使这种

一致性并没有延伸到这些范例的现代形式。这可以看作是一般的趋势。越来越高的精确性,以及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融合,在第二篇和第11章阐述的问题中将得到证明。

第17章讨论的主题“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上述趋势的一种极端形式。分析哲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在这里被用来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一些问题。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有些言过其实,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关注的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看法:理性的本质、结构主义的局限性、剥削的含义、经济理论向前发展的手段等。然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本书最后一篇讨论的另外两个问题也同样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可行性。第16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第二次经济衰退”的分析,第18章阐述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我们如果把这两章中讨论的问题同以前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相比较,就会看到,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明显的目的论和乐观性,已经屈从于更具分析性的和更强烈的实用性。第16章论及的一些著述者的某些理论篡改,可能与其前辈关于“大萧条”的著作相对立。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现在所承认的在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中必然要涉及到的那些复杂问题,不仅与1917年许多布尔什维主义者的天真的自信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也与斯大林主义者缺乏想像力的极权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注 释:

1. L. 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趋势》第三卷《崩溃》(*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ume III. The Breakdow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第494页。

2. T. B. 博特莫尔和 M. 吕贝尔编:《卡尔·马克思:社会学和社会哲学选辑》(*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3), 第84页。

目 录

译者前言	1
致 谢	1
导 言	1

第一篇 大萧条与斯大林主义

第 1 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大萧条	1
1. 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	1
2. 大萧条的原因	7
3. 结论	13
第 2 章 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	23
1. 斯大林体制	23
2. 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	25
3. 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33
第 3 章 苏联生产方式	49
1. 预期	49
2. 一个蜕变的工人阶级国家?	51
3. 官僚集体主义	57
4. 国家资本主义	60

第二篇 长期繁荣

第 4 章 “资本主义发生变化了吗?”	75
1.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75
2. “资本主义发生变化了吗?”	78
3. 法兰克福学派与非经济分析的萌芽	82
4. 没有结束的繁荣, 无止境的工商业	85

第5章 马克思与凯恩斯	91
1. 凯恩斯与马克思	91
2. 马克思主义者论凯恩斯:最初的回应	93
3. 凯恩斯主义者与马克思	97
4. 马克思主义者论凯恩斯:第二次和第三次思考	99
5. 结论	103
第6章 垄断资本	110
1. 引言	110
2. 《垄断资本》的起源	110
3. 介绍保罗·巴兰	114
4. 《垄断资本》	116
5. 《垄断资本》及其批评者	119
6. 评价	121
第7章 下降的利润率	130
1. 下降的利润率:1883—1918年	130
2. 1918—1945年	133
3. 1945—1973年	139
4. 结论	144
第8章 持久的军事经济	150
1. 引言	150
2. 1939年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和军费开支	151
3. 军事支出和有效需求	153
4. 武器和利润率下降	156
5. 军事支出的成本	158
6. 资本主义与和平	159

第三篇 新帝国主义理论

第9章 资本主义与不发达	167
1. 引言	167
2. 保罗·巴兰和《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169
3. 弗兰克的修正	173
4. 沃勒斯坦对弗兰克的修正	176
第10章 不平等交换	188
1. 伊曼纽尔之前的不平等交换理论	188
2. 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	191

3. 伊曼纽尔和他的批评者	193
4. 安德森重新表述的公式	196
5. 一些未回答的问题	199
附录 A: 有机构成不同导致的不平等交换	
附录 B: 安德森模型的数字例子	
第 11 章 对不发达理论的批评	206
1. 引言	206
2. 接合理论	208
3. 阶级关系与发展	210
4.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212
5. 资本主义在外围的发展	214
6. 结论	217
第四篇 价值与剥削	
第 12 章 斯拉法之前的价值理论	227
1. 第四篇引言	227
2. 价值理论: 1914—1939 年	229
3. 博特凯维兹的重新发现	232
4. 塞顿和萨缪尔逊	236
第 13 章 斯拉法和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	245
1. “资本争论”和萨缪尔逊的回答	245
2. “复杂的迂回”的进一步确证	247
3. “复杂的迂回”不存在	250
4. 马克思“迂回”的死胡同	252
5. 体现马克思精神实质的一个新的斯拉法迂回	255
6. 结论	258
第 14 章 斯拉法之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264
1. 引言	264
2. 早期的贡献	265
3. 萨缪尔逊争论	266
4. 森岛通夫和斯蒂德曼加入论战	269
5. 回到“历史上的转型问题”	272
6. 再次提及转型的逻辑	273
7. 价值理论的其他问题	277
8. 结论	279

第15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剩余经济学	293
1. 斯拉法马克思主义	293
2. 经济思想史中的剩余传统	295
3. 马克思主义对剩余传统的批判	296
4. 超越价值理论	298
5. 斯拉法分析的局限性	301

第五篇 当前的争论

第16章 “第二次衰退”:1973年之后的危机理论	313
1. 长期繁荣的终结	313
2. 对消费不足理论的重新讨论	315
3. 再一次提出利润率下降	317
4. “过度积累”与利润挤轧	319
5. 情感、意志和制度的积累	322
6. 国家与经济危机	325
7. 第二次衰退的教训	327
第17章 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	338
1. 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338
2. 罗默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看法	339
3. 罗默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某些局限	342
4. 微观基础和马克思主义	346
5. 结论	349
第18章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360
1. 引言	360
2.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后资本主义社会	362
3. 社会主义和第二国际	364
4. 对斯大林主义之前的苏联实践的反思	368
5. 兰格对米塞斯的回答	370
6. 斯大林主义经济学和非斯大林化	374
7. 可行的社会主义	377
结束语	393
附:人名译名对照表	403

第一篇 大萧条与斯大林主义

第 1 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大萧条

1. 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

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1930 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 9.9%，1931 年又下降了 7.7%，1932 年下降了 14.8%。1932 年，德国和美国的工业生产不及 1929 年的 47%（对其他资本主义强国来说，这次大崩溃不是全面的，但仍然是严重的）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于这次大灾难提出了两个问题：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意味着什么？如何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对它作出始终如一的解释？这两个问题都不简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并没有完整地得到概括，甚至没有形成有体系的结构，而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史又要求它有新的发展。其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得势、美国的“新政”以及国家干预在其他方面的增强。这就再次提出了国家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的作用问题，以及民众支持倒退或改良、而不支持革命的基础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这次危机的本质有着不同的看法。起初，至少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济学家并不感到兴奋。这次大萧条“既不是‘扬格危机’（Young-crisis），也不是合乎理性的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崩溃，也不是世界革命的到来”。弗里茨·纳夫塔利在 1930 年写道：“像每一次危机所表现的那样，这次危机仅仅是具有历史特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危机”。² 1931 年，卡尔·考茨基驳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结束这次危机的激进观点：“这种看法使我联想到那些生活在凉爽而湿润的夏天的人，他们认为这样的天气永远不会变暖，一个新冰川时代已经来临。”³ 像先前所有的危机一样，复苏是不可避免的；它会增强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足以使人们相信当前的危机是这

类危机的最后一次。考茨基的结论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未来的繁荣将把人们带入一个持久富裕的、持久安全的、并迅速把生产过程转向满足工人阶级需要的时代，我们应把这个时代的特征归为无产阶级革命。”⁴与这一结论相反，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得势，同时其他地方的经济复苏缓慢而不彻底。但不管是考茨基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似乎都没有修正关于萧条问题的自负的观点。⁵

可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同意法兰克福研究所弗里德里克·波洛克的观点，他认为这次大萧条比以前的危机更深刻、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甚至与1873—1879年的危机相比也不逊色，因此需要作出专门的解释。⁶有少数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长波”现象。除了已经认同的7—10年的商业周期外，还有以半个世纪为周期的经济波动。这一长波的下降阶段与其上升阶段相比，其周期性的扩张更为脆弱，衰退更为强烈，持续时间更长。这种观点最早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亚历山大·格尔方德（即帕尔乌斯）提出来的。在20世纪20年代，引起了德国经济学家沃尔夫和瓦格曼的注意，也引起了苏联前社会革命党人尼·德·康德拉季耶夫的注意，50年的周期便以康德拉季耶夫的名字命名。⁷大致情况是，上升阶段被确定为1851—1873年和1896—1914年（或1920年），相应的下降阶段为1826—1850年、1873—1895年及1920年之后。弗里茨·纳夫塔利尝试用长波理论解释这次大萧条，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则更为自信地推进这一解释，他们都强调农业价格下跌在下降阶段的作用。⁸但是，这种假想几乎无人赞同，例如，波洛克把长波理论斥为“形而上学的”，认为它建立在孤立环境中的“不可靠的泛化”的基础上。⁹

如果这次危机既不表示一次周期性商业循环的下降趋势，也不表示这一衰退由于受到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影响而得到加强，那么期望实现积累率或产出和就业的持久复苏似乎是毫无根据的。所以，人们可以认为资本主义注定要陷入持久的停滞，或者濒临经济崩溃。一般说来，严格意义上的崩溃的观点——断言由于纯粹经济方面的理由，可获利的经济增长很快会变得不可能——在1914年以前比其后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当然，亨里克·格罗斯曼在华尔街崩溃前夕曾极为热情地鼓吹这种观点。¹⁰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在第17次党代会上宣布的代表苏联官方的观点称其为“特种的萧条”，会有“有限的复苏”。这就是说，它既不是真正的复苏，也不是陷入低谷。用共产国际首席经济发言人尤金·瓦尔加的话来说，大萧条已经“引起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大紊乱，开始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致使伴随危机的革命的客观条件日趋成熟”。左翼反对派的前理论家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20世纪30年代一时得到人们的重新拥护，他同意这种说法，即“假如它没有引起世界大战，或者没有被一场技术革命打断，在垄断制度下的总体性经济危机肯定会突破其经济结

构,并成为一场整个资本主义历史制度的总体社会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地区(如美国)可能重新走向经济高涨,但这是以牺牲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为代价的。¹¹

弗里德里克·波洛克小传

波洛克于1894年出生在弗莱堡,是一个犹太商人的儿子。他起先经商,1918年以后在慕尼黑、弗莱堡和法兰克福学习经济学和政治学,在那里他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学位论文。从1924年开始,他与法兰克福研究所负责人卡尔·格林贝格合作研究,并在1928—1930年担任该研究所的代理所长。波洛克在1927年应达维德·梁赞诺夫的邀请访问苏联,专注于他的研究领域,他在一部主要著作中论述了两年后在苏联出现的计划问题。希特勒上台迫使波洛克与他的朋友马克斯·霍克海姆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一些主要成员一起来到纽约,这时他已经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最重要的经济理论家。波洛克强烈地抨击了经济决定论;在分析国家资本主义时,他坚持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的首要地位。1945年以后,他在返回德国之前一直住在加利福尼亚,1970年在瑞士逝世。

越来越多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相似的看法。持不同意见的美国共产党人刘易斯·科里在承认“衰退不是崩溃”的同时,仍然把大萧条看作是经济不稳定和停滞趋势不断发展的证明,它预示着资本主义制度“最后的、永久性的危机”。

在德国,纳塔莉·莫斯科斯卡把日益严重的危机,看作是永久性危机的危险信号,而永久性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即将垮台。她的同胞弗里茨·斯滕伯格认为,有三个理由可以相信复苏将是极其困难的:不再有新的海外市场可以利用;工薪者、文职雇员和独立的中产阶级前所未有的贫困化,已经毁掉了一个重要的内部稳定器;大规模的失业和实际工资的削减,使国内需求的复苏异常困难。¹²

刘易斯·科里小传

刘易斯·科里(1926年开始采用这个名字)于189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路易斯·弗兰那,3岁时到美国。在纽约,他在贫困中长大,14岁就离开学校。科里在社会党、社会主义劳动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表现活跃,1919年由于其早期反战活动而遭短期监禁。他是美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中的一个,1922年由于抗议该政党对莫斯科的奴性表现而退党;但是,在后来的十几年中,他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科里最初当过店员和校对员,后来当过调查员和编辑、工会的教育主任,而且还是安蒂奥克学院的经济学